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交流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李何林论稿

Comment on Li Helin's Academic Research

姬学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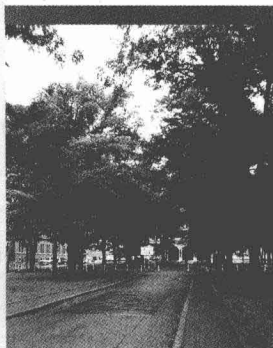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校社科文库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ries

教育部高等学校
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汇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学术成果
搭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平台
探索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著出版的新模式
扩大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



李何林论稿

Comment on Li Helin's Academic Research

姬学友/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何林论稿/姬学友著.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9. 11

(高校社科文库)

ISBN 978-7-5112-0468-4

I. 李… II. 姬… III. ①李何林(1904~1988)—人物

研究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K825.6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4314 号

李何林论稿

作 者: 姬学友 著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田 苗

责任校对: 陈 新 熊霁明

特约编辑: 段 晖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945(发行), 67078243(总编室),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发行), 67078255(办公室)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本: 690×975 毫米 1/16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5.75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12-0468-4

定价: 35.00 元



布道者李何林（代序）

孙 郁

—

后代人看自己的前辈，如果背景相差很远，对有一些人的行踪是难以理解的。以书本的教条去要求前人，是现在的学者常常犯的错误。有时看历史人物的评价，差异是那么巨大，所以当我也想品评别人的时候，就有忐忑不安的一面，不知道怎样下笔。过去也有过妄谈历史的毛病，自知有些滑稽。但毛病依旧，那也是没办法的了。比如最近在想一个问题，一个人信仰什么的时候，精神上便易呈现出单纯的色调。钟情于安那其主义的巴金，沉浸在佛学里的丰子恺，其文本都不那么复杂。学术研究好像也是如此。有驳杂的学人，也有单纯的专门家。单纯也许不深刻，没有丰富与深切感，但那清晰的思路与思想的张力，往往给人以深深的印象。这样的看法对吗？于是便想起拿历史的人物做个案的分析，想来想去，便想起了李何林先生。这也是本文写作的缘起。

李何林先生是鲁迅研究这一学科的奠基者，接触新文学的研究者差不多都知道他。许多年来，他的几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一直被人们所提及。我曾读过一遍《李何林全集》，特点是鲜明的，那就是终身在鲁迅的背影里，以阐释鲁迅为己任。在年轻的时候，新文化的各种思潮吸引了他。应当说，他是从各种思潮的交锋里注意到鲁迅的。第一次接触他的那本《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时，很佩服其史家的眼光。材料是丰富的，有的内容现在的青年人已不了解了。通过这一本书，我相信能捕捉到文化的脉络。此后他对现代文学史和鲁迅文本进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而且其基本观点已渗入到文化领域，一个学科由于他的努力，终于建立了起来。



文学研究这一行，夹杂了诸种色彩的人。有的为学术而学术，有的因信念和寄托而深思。李何林属于后者。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多少有一点旧文人的积习的。比如台静农、阿英等等。在泼墨之余，有吟哦词赋的雅好。李何林身上没有这些，几乎未受旧学的熏染。看他梳理文学思潮史时，面对废名、刘半农、梁实秋等人，无一点企羡的语调，对士大夫遗风是厌恶的。他也不在唯美的形式中自娱自乐，对浪漫主义者的文字只是冷冷的一瞥，自己还是岸上的看客，并无共鸣的兴奋。李先生是个单纯的君子，所谓中和雅正者正是。在与文学相逢的那一刻，思考的是非唯美的课题，旧式士大夫的孤影与洋人的自我陶醉，与其都很远了。把握了这一点，大概也就能看清他与文学史间互动的内因。李先生的特殊性或许在这里。

与他同代的几个学者如王瑶、唐弢，在治学的方法与文字趣味上是大大不相同的。王瑶由古典文学研究的训练而入新文学研究之门，身后有学院派的影子。唐弢是名作家，靠着良好的天赋和史料学准备，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园地。李何林是个革命者出身，因政治受挫而转向学术，立人与立学系于一种社会情怀。他在南昌起义失败与家乡暴动失败后，流亡北平，思想深处是些社会变革的渴望。青年李何林面前的难题是社会改造而非书斋里的沉思，这个背景几乎影响了他一生。当把目光转向文学时，自然将兴奋点落到写实主义与批判精神的作家身上。出于这一背景和环境，后来的道路自然是走向学院而又是反学院派的。

在《我的文学研究与教学生涯》一文的开头，他就这样写道：

我是没有创作过的人，平生一首诗、一篇小说、一幕戏剧也没写过。我一生不吸烟不喝酒，也没有“烟士匹尼纯”（inspiration 灵感），早睡早起，生活有规律。所以有的朋友说我：“你简直不像个搞文学的！”……从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军起，五六十年来我主要从事教书匠的工作。教书，自然要不断地学习和研究；而鲁迅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创作需要热情，而研究则需要冷静。如果二者兼顾，则忽冷忽热是矛盾的。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是既能创作，也有许多研究成果的，又怎么说呢？还是因为我缺乏形象思维和表现的能力等等罢？

自称是非文学创作的材料，可偏偏喜欢文学研究，这在他那里形成了一种倾向：不是从感受与性灵的角度打量文本，个人式的话语被抑制住了，关注的是思想层面的存在，即从社会的关系中看待文学。而他所关注的思想，又与中国文化走向有关，有鲜明的价值态度。文与人，系在道德激情的层面。王瑶、



唐弢也有类似的特点，只不过没有其更为鲜明罢了。

较之于形形色色的学人，李何林是个布道者的形象。他的固执与坚守，使鲁迅研究成了一门显学。而一切又是与种种思潮的搏斗中完成的。有人说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学派。不管正确与否，事实是，鲁迅思想的普及，他倾力甚多，当他出现的时候，无论哪一学派的人，面对着那双眼睛，都生出了一种敬重。没有见过他的人如今已难以从其文字里感受到那种威严了。

二

1929年，在“未名社”避难的李何林编了两本颇有影响的书：《中国文艺论战》和《鲁迅论》。这些与俄国的文化思潮的影响是有关的。他那时大概觉得，中国差不多正在发生俄国式的革命。1938年至1939年，又编著了《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这三本书透露出他的基本思路，即在纷纭复杂的世界里，摸索到新文学的方向。李何林是熟悉鲁迅文本的，但那时却很少写研究文章，不过透过其编辑思路，能够感受到他那时的学术情怀。他读了那么多的书，但却在鲁迅那里停了下来。他的人生目标就此确立了。鲁迅文本纪录了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档案，如何面对人间和自我，都有着有趣的探讨。奇怪的是那时他疏远了对政党理论的研究，反而从非党派的作家鲁迅那里看到了自己更为需要的东西。李何林眼里的鲁迅是略带现代圣人的英姿的，或者说是民间斗士的代表。鲁迅何以成为鲁迅，其精神特征的内在结构如何，都被省略掉了。李何林接受的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鲁迅，作为知识界的良知，鲁迅提供的话题，比以往任何一位作家都要丰富。他要捍卫的也许正是其中的这种丰富。

但那时鲁迅文本尚未被学界普遍关注，同代人对身边的存在是缺乏眼光的。鲁迅死后受到嘲骂，比许多作家都要多。1936年《世界日报》借鲁迅之死大做文章，发表了挖苦的报道。李氏以悲愤的心写下了《为〈悼念鲁迅先生〉的愤言》，向诬蔑逝者的人文人还以冷眼。我在文章中感受的不是学究式的凝思，他的文字在那时还不具有久远涵泳的特质。李何林不能容忍的是人们对文本的断章取义。在咀嚼小说、杂文时，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停留在文字的细节与片断上。而是文脉所指的核心即精神的终点。当叶公超说鲁迅是一个“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者的时候，李氏却坚持说那“个人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表面背后，是别样的存在，现实关怀更为浓烈。没有了现实感的文本，会堕入幻灭之中。而鲁迅文本给人的却是不安于黑暗的存在，那才是他的



内在魅力。叶公超在1936年谈鲁迅的那篇文章，不失为一家之言，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有自己的独到处的。问题的复杂在于，叶氏只是一种远离现实的观感，对许多文章了解甚少，缺少全面的打量。与李何林这样谙熟作品与背景的人比，自然有捉襟见肘处。当他说鲁迅小说“丑角的色彩”和“杂耍”的成分多时，站在的是学院派的立场，言谈有脱离具体语境的地方。但李何林却以为，叶公超恰恰忽略了“丑角”、“杂耍”后面的作者态度。那个悲悯之情和忧患深广的文字后，有浩大的情怀，是从民间流出的歌咏。“含泪的笑”不是所有的人能理解的。李何林在《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一文里，表明了自己的这个立场。他的学术基调，是从这里开始的。

20世纪30年代以来，解读鲁迅者在观念上有很大的反差。鲁迅涉及的问题也恰恰是他身后一代知识群落关注的问题。李何林自己就感到，人们欣赏鲁迅时，多是以自己的爱好出发，并无鲁迅式的胸怀，其目光很快就从作品中滑落下来，未能深深地盯上或钻进骨髓。在教书中他感到了这一点，所以希望人们能在更深的层面把握问题。不过他自己在那时也流入困顿里。我注意到他使用的概念，也有力不从心处。即使与别人论战，观点是立得住的，而叙述语态却未能让人信服，一些语句对鲁迅文本而言仍然是隔靴搔痒的。比如鲁迅在困顿时与四面黑暗的搏斗就有难以理清的驳杂和诘问。李何林却以简单的概念描述之，未必能使论敌服气。40年代末他在台湾教书时，写过一篇《读〈鲁迅书简〉》，内在的感觉是丰富的，文中透出心心相印的一面。略让人感受到不足的是，呼应的地方占了主调，未能跳将出来，反身自问，或从对比的视角打量问题，无法构成一种学术意识。作为一名老师，做到此点已经相当不易。后人读这篇旧作，参照研究对象，不妨也问：为什么不能从问题的入口走得更远些呢？

那个时候的李何林，面对鲁迅时不是表现一个学者的态度，相反，他反感的是恰恰是一些学者的矫态，正是他们将鲁迅玷污了。作为一种资源，鲁迅给人的远远超过学问家的启示，那里确切地讲是一种人生的暗示。中国人的苦乐系于其间，新的路是应由此伸展的。李何林在那时感到了鲁迅无所不在的辐射力。中国社会的重要棘手问题，在鲁迅文集中都涉及到了。文学家鲁迅何以做到了类似百科全书式的伟岸，以至于使李何林成了这一存在的宣讲者与布道者。在梳理着这一问题时，有一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在瞿秋白的那个时期，鲁迅作为一种问题现象，被追问的是他是什么？他的精神是如何被开展的？这个话题瞿秋白有自己的答案。其实本可以有无数种解释与精神的对流。这些我



们在日本学者后来的论著里看到了，而且五花八门。但自毛泽东的讲话之后，关于鲁迅已不再是一种追问的存在，相反，是不言自明的遗产。于是与鲁迅的复杂的对话与精神碰撞被搁置了。学术的许多可能性变得不再可能。吸引李何林那代人的是中国的道路如何走的问题，亦即文化建设与新型国家建立的民族大计。当一种被认为是正确的思想出现之后，确立它、巩固它成为当务之急。这是致力于社会改造者的境界，他们将个体的精神角斗和思想的探索让位于信仰了。李何林自愿在鲁迅的旗帜下思考着什么，却不愿独立地放逐自己于荒原里重新开始精神之旅。那一代人的可贵和悲剧大概都系于此处，不像现在的青年人会这样说，只有一个鲁迅便够了么？为什么不自己开始呢？

三

在陆续接触了李何林的文章后，我忽生出这样一个感想，那就是为什么这一代人在面对文学史时，没有产生类似日本的竹内好的问题意识。同样是在40年代，中国的学者阐释身边的现象时，好像过多裹在价值判断上，没有谁能从复杂的关联中直抵问题的核心。竹内好在40年代就十分精彩地发现了鲁迅的混沌，描述自己的感受时，能用复杂化的语序直指复杂性化的文本。比如在《政治与文学》这一章里，竹内好如是说：

很多人并没有在鲁迅的绝望之处绝望。人们因此而成为庸众。蠢人的希望是可笑的。他笑了。他嘲笑了同时代的许多人。他嘲笑了胡适，嘲笑了徐志摩，嘲笑了章士钊，嘲笑了林语堂，嘲笑了成仿吾。然而，与其说是嘲笑了他们，倒不如说是他藉此嘲笑了自己。可以嘲笑希望，但嘲笑希望的笑，也是在嘲笑绝望。他并没有安顿在绝望里，而是对绝望感到绝望。倘若只是走入绝望便止步不前，那么他就只是个虚无思想家了。

我在读这一段话时，发现了言说的另一种可能，可惜它被外国人使用了。李何林那一代人在心灵感受上未必没有意识到类似的问题。那些无序的过程对他而言属于另外一种话题。他要回答和论证的，则是与之相反的东西。即在黑暗的语言世界里，找到明晰的光泽，将被吞没的鲁迅高扬出来。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青年批评家的思路，大多是有类似的特征的。胡风、聂绀弩等人的文章在本质上也有同样的风格。鲁迅的表达特征吸引了人们，可他的追随人却没有谁能用复杂的参照进入其中，自己的言说逻辑与研究对象的逻辑出现了黑白式的反差。



而在另外一些文人那里表现了另一种倾向。唐弢、聂绀弩等少数人，在杂文写作默契依傍着鲁迅的风格，有的地方甚至受暗示很深，以至于推广了鲁迅传统。不过在进入理论层面的思考时，他们和学界的思路很像。我感觉他们在解释社会时，还停留在表面上，鲁迅深层次的问题并未碰到。在用理论式的用语陈述看法时，鲁迅文本的纷纭意象也被简化了。李何林在他的研究中，越来越认可这样的简化，他和自己的同代人似乎都相信，在多重意绪和难辨的混沌里，明确的指向，清晰的图式对读者而言更为重要。中国有一位学者在那时是可能具有反简化倾向的，那就是顾随。他在大学讲授鲁迅，比李何林还要早些。遗憾的是未能坚持下来，后来将兴趣转移了。顾随本可以沿着诗化哲学的路径走进《呐喊》、《野草》这样的作品。在其个别阐释文字里已有了这样的端倪。问题是旧式学人的情调多了起来，萌生的冲动被渐渐压下去了。李何林从一开始就拒绝旧式学堂的雅兴的。他是那时很少几位摆脱古文纠葛而坚守白话世界的人。未名社的几个作家、学者后来渐渐书斋化了。台静农沉到古代，李霁野喜欢上了周作人式的学术生活。李何林却以斗士的姿态走着自己的路。所以他后来对鲁迅的宣传与普及，始终有一特点，那就是拒绝把鲁迅引入书斋，引入“学术”。坚持认为惟有在社会关怀与解决人生问题的过程，才能切入研究的母题。

当他全力进入鲁迅世界的时候，面临的是一些非鲁迅化的重重迷雾。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他与来自左的和右的几方面势力进行着周旋。有意思的是，鲁迅生前并无清除敌手的用意，只不过嘲笑一番罢了。他死后却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受到无端的指责。其实鲁迅的存在本不需保卫，他的作品在那里，轰是轰不倒的。李何林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是和反鲁派的阵营对峙，做的是批判性的工作；另一方面是与左翼队伍、特别是文化权力部门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交锋。李何林自始至终是把自己卷入到现代思潮的论辩里的，参与性的结果，就是放弃了问题意识打量的可能，使学问变成人生搏斗的一部分。长达半个世纪的风雨，他从未以局外人的角度梳理文学史。始终自觉地位移到文化教育思潮的激流里，并且将自己视为其中的一员。他挑战夏衍，批评茅盾，就仿佛也列入鲁迅的身边一样。在全集呈现的论文中可以看到，涉及的所有话题，几乎都和时代的语境有关。50年代有人提出鲁迅前期思想中资产阶级因素较多的时候，李何林就详尽地探讨着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其进化论的意识里，也包含着唯物主义的萌芽。学界有一个时期批判胡风、冯雪峰时，流行着鲁迅“受蒙蔽”、“失察”、“无知人



之明”的说法，李何林则以史学家的身份站出来表态，对周扬、茅盾并不客气，还原着历史的原貌。“神化鲁迅”的话语四起的时候，他却一反潮流，阐释鲁迅超越时代与历史的根由，将基本态度陈述出来。借着鲁迅，回答现实挑战，构成了半个多世纪李何林的基本价值法则和研究态度。也因为如此，鲁迅学的象牙塔化，在他那里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与曹聚仁、林辰这些学究化和文人化的研究者不同，李氏更多地继承了战士鲁迅的形象。

四

我有时读着他的遗著，想着今天社会思潮的变化，也有一番复杂的感叹。如今，年轻一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不太引用李何林那代人的成果了。我注意到一些博士论文在碰到棘手的难题时，都从王瑶、唐弢、李何林那里绕过，寻找的是别一类的资源。这一件事引发了我的悲凉的感触之余，倒不是为前人感到不平，其实根本的还是两代人间的隔膜，确切地说是时代与时代的隔膜。李何林之于现代文学以及鲁迅遗产，与年轻人不同的是将其看作自己生命的过程。他的解释鲁迅，是顺着文本的思路接着讲下去的。而年轻一代则是有时逆着文本的思路讲下去的。顺着讲，是思想的引申，没有离开作品的语序。逆着讲呢，就要打碎言说的空间，整个逻辑都要变了。《李何林全集》呈现的世界都不是艰深的宏文，作者一生甘愿做的都是普及的工作。所有的论文都不突出自己的理论，几乎都在鲁迅的影子里。不突出自己，就不得不做大量的注释，力求寻找经典世界的原色。他是不是会这样想呢，在直面人生的时候，鲁迅的观点已十分的精到了，何必再支费口舌呢。而自己的要务就是将隐曲的东西，深入地解释出来，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其中的始末。文学思考本来是独立的劳作，而在具有布道意识的人那里，放弃自我的主观暗示，忠实于经典的笺注，也许比夸夸其谈以及任意的发挥更为重要。

在李何林的所有文章里，其针对的对象都是学生。既不是在确立批评家的身份，也非学问家的姿态的表演。写作不是建立自己的体系，重要的是做一个引路者，就像迷津里的指示牌，当人们从茫然中沿着它走进新的天地时，那么自己的任务也就完结了。《鲁迅〈野草〉注解》、《中学语文鲁迅作品答疑》、《〈狂人日记〉讲解》、《鲁迅〈柔石作二月小引〉试解》、《〈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是个什么人物？》、《鲁迅作品题解一组》等，一看即知是导读式的文字。李先生安于写这样的文字。文章通篇细致、严谨，没有半点马虎、温吞的地



方。材料的运用与观点的陈述，对青年学子而言都是有启发的。至今读了亦有不少解惑的地方。理解鲁迅，仅仅从玄学与先验理念出发是要命的，关键是文本的细读。在大量细节的感受基础上，才有可能开发理论性的东西。在先验性流行的年代，坚持文本解释的立场，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我在与这些文字相逢时，内心每每生出一种感动。

精解文本，特别像鲁迅的文本，其挑战性超过了先秦诸子。李何林对此不是没有困顿。一方面是对基本看法的自信，许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就是这风格。另一方面，也常常表现出一种小心谨慎，知道不能武断的引文。关于《野草》研究的那本小书，是他很重要的著作。不过不是学理性与学术性的，而是一种串讲，完全是讲义性的，是浅显易见的小册子。选择《野草》作为课题，并一句句讲解下来，对研究者而言是个苦苦的跋涉。那样一本诗化的作品，过于讲实，易流于平淡；太偏于哲学，又晦涩难懂。坦率说就知识结构与个人趣味而言，李何林并不适合做这类的工作。但书的影响在那时却是很大的。70年代初，人们还不太敢谈“绝望”、“死灭”那样的话题，讲下去要么趋时，要么自娱。但这一本研究著作没有这些。书中看到了鲁迅的复杂性，和文字中的不可理喻性。困难的地方也显示出来了，也有牵强的表述，印有“文革”时代的痕迹。深层领域，却是独立的判断，和流行观点是迥异的。在歧义增多，隐喻叠出的地方，尽力将问题简化，以浅显的语调表示出来，是必须做的选择。作为一名教员，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也是一种欠缺吧。

我阅读李何林的研究文字，每每有被电击的感受。不是见识上的深吸引了我，感动人的却是文字后面的神圣的态度。显然他不是以圣徒的姿态进入宣讲的行列，鲁迅也没有被其神秘化。吸引人的是那种叙述语态，完全没有陈腐气与西崽气。炫耀的东西，故作高深的东西，以及雅人化的东西几乎消失了。他纯净得像冰山上的雪莲，几乎没染杂质。那么恭敬、神圣地书写着自己的言语，将人间的精神纯化到蒸馏水的地步，既不把己身的体验强加到客体上，又未带实用主义痕迹。在讲述文学史与作家论的时候，我们在背后也看到了一幅他的动人的影像。

五

在世人眼睛里，李何林辉煌的一页是在晚年完成的。他生命最后十年对鲁迅研究的贡献令人惊叹。1976年北京成立了鲁迅研究室。他离开了工作了24



年之久的南开大学，担任研究室的主任。不久做了鲁迅博物馆馆长。一时间国内重要的学者都集中到了研究室：王瑶、唐弢、林志浩、陈鸣树、王得后、陈漱渝、李允经……李何林当然成了核心的人物，且影响了当时的研究路向。不过那时的困难是重重的。“文革”尚未结束，当“四人帮”倒台后，学术界的棘手问题多未能解决。鲁迅研究在那时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的。“文革”语境在延伸着，人们并未从阴影中走出来。后来陆续出山的周扬、夏衍等人对历史的理解和鲁研室的冲突一直存在着，纯粹的研究还不能顺利进行，人们连一些史实都尚不清楚。在这样的時候，他意识到了学术基础的重要，具体地做了以下几项工作。其一是组织人编写《鲁迅年谱》，动员了许多人加入研究行列；其二是出版《鲁迅研究资料》，将大量的历史陈迹打捞出来；其三是编辑《鲁迅研究动态》。这个刊物现在变成了《鲁迅研究月刊》，成了重要的研究阵地。这是鲁迅研究史上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工作，在今天已是一个清楚的事实了：如果没有基本史料的整理，深入的学术思考是不可能的。

关于史料的钩沉，有几个人物是重要的：杨霁云、孙用、林辰、李霁野、曹靖华等等。他们都成了研究室的顾问。中国学人对史料有一种较好的传统，明于真伪，细于审辨。李何林发挥了众人之长，一些新的成果也在不久问世于学林，影响不浅。他那时有几篇文章深深地吸引了我。一是与夏衍论战的，毫无让步，是保卫了鲁迅及身边的学生的；二是与周扬的冲突，在高官面前亦无退缩的懦弱；三是反驳矛盾的文字，不唯上，不唯书，将伪饰扯了下来。胡风尚未平反时，他对这位鲁迅学生的同情及呵护，完全不顾己身的得失。鲁迅研究在70年代末纠葛的往往不是学术问题，相反却是是非问题。王瑶、唐弢的思考是避免后者，偏于前者的。李何林自觉地倾向于后者。作为一个从南昌起义及抗日战争过来的人，对己身周围曾有的历史，不可能进入到象牙塔的静观里。鲁迅研究之于他是个思想意义的存在，而非僵硬学术意义的遗产，或者说不能将其一下子列入博物馆中。即使在他成为博物馆的馆长后，对工作的要求也非博物学范畴的，恰恰相反，是社会学层面的。不是把研究内敛到古堡里，如西洋人对莎士比亚的阐释，而是不断出击，将视野放置在社会思潮的涌动中。在七八十年代的文坛上，李何林以论战著称于世。在诸多讨论会与讲演里，非立论式的驳论，在他那里有虎虎生气。在与周扬的通信里直言不讳地阐释自己的观点，倒是让人觉得，是一个得到了神谕的人，四处与非信仰者搏击着。许多年过去，读着先生的一些文章，也许觉得并不精彩，有的甚至未必精当。我的看法是，他的行为与工作中产生的激情与信念，比其文字更为重要。



学术之于李何林，乃人生是非的闪动，人们可能游离于时代外，精神活动在于生长在社会泥土里。所以行动的意义超过了书斋里的默想，学术也可以以布道的方式而存在。耶稣、孔子之后的一些门徒，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

解释经典的过程，其实也是自我建构的过程。任何一个文本的解读，其结果都有相左的地方。我在李何林的文字里也读到了许多并不懂的东西。有时甚至在价值上有相反的内容。是不愿意布道或选择了象牙塔的缘故，还是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呢？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与前一代研究者是不是同样处于一种偏执的藩篱呢？我有时还不敬地想到：为什么要强烈地处于是非的冲突里，而不是在思想的层面冥思？那一代人何以在布道上有如此大的冲动？难道就没有另一种选择么？譬如他晚年对曹聚仁的抨击，在我看来就有一点简单化，其实是忽略了鲁迅传统中的另一侧面，那就是作为斗士的鲁迅无意中产生了学术上的超时代性和精神上的超功利性的无限可能。鲁迅的意义在于除了现实层面的冲击力外，还有构成精神哲学的伟力。无论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还是从人本主义的形态上看，他的存在一直纠缠着现代人类的困顿和走向。一旦从这个走向延伸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旧有的一些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仅仅从单面的角度理解这个存在，就将问题狭窄化了。后来，只是到了他的学生王富仁、王得后那一代，学理的分量增加了，人们不再单单从政治的路途出发去解释历史。我们终于有了可以和竹内好、丸山升一样深切的研究文本。待到汪晖和王乾坤那些人出现后，鲁迅研究的单面性才开始结束。李先生就是这样一点点离开了人们的视野。在这样思考之后，其实我也有着一种疑惑，也许自己的偏好并不都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假若没有李何林那一代人在是非面前的生命抉择，也许就无法出现后来的思辨理性研究方式对其局限的补充，是非之争与静思之学，或许正是思想运动的两因子。谁能说纯粹的精神静观里，没有真伪、对错之别呢？只是我们过去缺少丰富的对应，对鲁迅的复杂意识尚未深究。李何林之后的人们，要做的其中之一，也就有深究的工作。其实，这样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本文作者是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CONTENTS 目 录

引论 写作缘起与意义 / 1

第一章 新文学史家李何林 / 6

第一节 李何林的学术选择 / 6

第二节 李何林的学术生涯 / 18

第三节 李何林的学术思想 / 27

第二章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文学史属性(上) / 41

第一节 《思潮论》的编撰背景 / 41

第二节 《思潮论》的理论资源 / 47

第三节 《思潮论》的价值取向 / 77

第三章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文学史属性(下) / 108

第一节 《思潮论》的文学史观 / 108

第二节 《思潮论》的研究体例与叙事方式 / 113

第三节 《思潮论》的史学品格 / 125

第四章 变与不变之间:学术转型 / 141

第一节 “进步的科学方法” / 142

第二节 《〈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 / 147

第三节 “找成分” / 160



第五章 《小问题》,大事件 / 172

第一节 《小问题》的问题 / 173

第二节 批判者的逻辑 / 178

第三节 历史的深度反思 / 186

第六章 学术使命与岗位意识 / 194

第一节 “保卫鲁迅”新动向 / 195

第二节 思潮研究新课题 / 213

第三节 史料建设新成就 / 219

结语 学科史上的李何林 / 223

主要参考文献 / 230

后记 / 233



引论

写作缘起和意义

本书以新文学史家李何林及其学术业绩为研究对象，抓取李何林学术生涯中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事件，采取知人论世的研究态度和 20 世纪中国文学整体观的学术理念，着力探讨李何林的学术选择和学术实践，深入阐释其学术代表作《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系统考察李何林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有机联系，彰显李何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重要创始人的历史地位。

对具有代表性的新文学史家及其学术业绩进行具体论析，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学科历史和学科构成）建设的任务之一。这种“典型个案”的研究，和宏观描述学科研究进程、重点梳理学科研究成果一样，是不断拓宽学科研究领域、培育新的学术生长点、推动学科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长远需要。

李何林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创建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开拓和推动作用。对这一“典型个案”的标本意义进行深入探究，既可以使学术史上的李何林集中、明晰起来，为学科建设提供相关的理论依据、背景资料和经验教训，丰富学科史研究的内容，也可以增加学科史研究的信度。

但是，目前的研究现状是，对李何林及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的关注不够充分，和李何林作为资深望重、对学科创建作出重大开拓性贡献的新文学史家的地位不大相称。表现在：

一、研究者一般也都承认李何林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始人的身份和重要性，但在谈到其具体的学术成就、涉及到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生成之间的关系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加以忽视，缺乏足够的兴趣和精力去认真发掘。即使研究，语焉不详、定位模糊或者误解误读的现象也比较常见。例如有的学者对李何林作为学科创始人的代表性和身份也表示怀疑。比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陈平原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后记》中的一段话：“这回由



我主事，‘二编’中理所当然地将现代文学学科创始人王瑶和唐弢列入。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形成做出贡献的，早期还有胡适、周作人、陈子展、阿英、李何林等，这里只是考虑代表性，以及能否找到合适的研究者。樊骏的谈论唐弢，以及孙玉石之研究王瑶，在我看来，都是最佳人选。既了解研究对象的脾性、思路与学术贡献，又能保持史家的独立判断，不为私人感情所左右，这点很不容易。”^①按照这一看法和原则，李何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创始人的代表性显然是不够的。这与李何林自评的“我所走过的文学生涯道路上的足迹，也可以从中看出我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界的一个不重要的方面”，^②以及他的一些研究者说的“他是一个重要方面军的代表”^③的看法形成了有趣的背谬。这就容易导致学术界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这一课题时，对李何林这一“典型个案”的标本意义关注不够，影响学科史研究的深度和信度。

二、一般研究者很难将兴趣和精力集中到李何林身上，这是一个既不时髦也不好玩更带不来轰动效应的题目。而亲朋好友学生笔下的李何林，大多是谈他的“正道直行”与人格力量，而不怎么研究其学术业绩本身，尤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导致他的“正道直行”与人格力量失去根基，战士形象凸显，学者身份弱化，这也是造成作为新文学史家的李何林学术定位模糊的原因之一。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论文和学科史、批评史著作，涉及到李何林的学术业绩和具体研究成果。如专论李何林学术代表作《思潮论》的两篇论文，李培澄的《开拓与耕耘》和田本相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及其在现代文学学科中的地位和价值》，对《思潮论》做了提纲挈领式的简约总结和归纳，但较少切入《思潮论》丰富的本体，对其进行翔实而具体的微观和实证研究，与所持的观点和得出的结论相比，材料举证和论证过程略显简单。特别是对《思潮论》写作的学术准备、理论来源、价值取向的分析，以及对《思潮论》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进程的关系的梳理，因为整体格局的限制和文章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充分展开，以至于有些很好的观点和结论未能落到实处。即使

① 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第50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

② 李何林：《我的文学研究与教学生涯》，《李何林全集》第1卷，第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③ 王得后：《鲁迅研究一个重要方面军的代表》，《鲁迅教我》，第11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